

维护政治统一，同时又不牺牲其成员所具有的独特性，将多样性与整体性协调起来发挥作用”。^①

进一步而言，制度选择的关键不在于单一制或是联邦制学理上的可行性，而是某种国家结构形式能否满足当时的地方与中央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并且能以妥协的方式建立一种合适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1787年美国联邦制选择就是一次成功案例。费城制宪会议最后的制宪结果，既不是联邦主义者鼓吹的中央集权，也不是反联邦主义者维护的州权主义，而是一种符合对立双方共同利益的美国式联邦制，这种制度选择也符合当时制宪会议的目标，即必须要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能够阻止国家分裂的中央政府。

在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要求地方分权的省宪主张，比较符合当时国内反直实力派维持分治的利益格局。主张中央集权的直系北京政府最后作出妥协，同意省制入宪与地方分权，“省的法律地位，以及纠正过分中央集权的观念，却成功地在中国宪政思想上，第一次被肯定下来”。^②最后的制宪结果——1923年民国宪法遵循联邦制原则，设计出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其核心是在确保国家统一的原则下，创立合理的联邦分权制度模式，彰显联邦制度的功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国民革命兴起后，在我们这个缺乏分权宪法文化传统的国家里，联邦制的选择不再具有任何实质作用与意义，中央集权再次成为国民党人新的制度选择。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民国国会与近代中国法制建设”（13ZS0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严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44）。〕

① [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74页。

②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

民族主义的可贵与可爱 ——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的两种进路

瞿 骏

1936年，一代中国文化巨擘章太炎去世，各家纷纷追叙太炎的生平、学术与思想。其中钱穆的看法颇值得注意，他指出太炎与其他学者一大不同之处在于“近年来之学者只知民族主义之可贵，不知其可爱”。^①此话虽然简略却点出了自清末以来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的纷繁复杂的进程，是钱穆作为史家的一大洞见。以下我试着对民族主义的“可贵”与“可爱”这两个面相略加分析与讨论，以期稍稍认识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的多元进程。我们先来看民族主义“可贵”之一面。

1906年7月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所谓“民族思想”一定要自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②陈垣亦几乎在同时发现：“迩来风潮澎湃，不知由何处吹入民族主义一名词来。”^③所谓“收拾学理”和“风潮澎湃”都可看出西来的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对于清末读书人知识结构的冲击和在其内心造成的激荡。这套观念配合上“转型时代”（1895-1925）兴起的学校、报刊、学会和因现代技术而突飞猛进的传播条件，无疑为不少时人看来“一盘散沙”（当然是否真的“一盘散沙”值得再做考察）的中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凝聚力。到1934年胡适就看到了中国人了解民族主义之“可贵”后出现

① 钱穆：《对于章太炎学术的一个看法》，《史学消息》第1卷第3期，1936年。

②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9页。

③ 陈垣：《种族之界说》，《陈垣全集》第1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9页。

的新局面：

在那割裂之中，还能多少保持一个中国大轮廓，这不完全仰仗那些历史的大维系，其中也还有一些新兴的统一势力。第一是近几十年的新教育；第二是一些销行全国的大报纸；第三是从报纸与学校里传播出去的一点点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爱国思想，居然能使一个地方发生的对外事件震撼全国，使穷乡僻壤的小学生认为国耻国难。第四是新兴的交通机关，如电报、邮政、轮船、铁路、公路等等，也究竟缩小了不少的距离，使全国各地的人增添了不少互相接触的机会。^①

除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提供了统合国民的凝聚力之外，民族主义的可贵一面更体现在其帮助中国人同仇敌忾对抗外敌之上。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人对抗东西洋列强入侵的历史过程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②如果说清末的“亡国灭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现实与想象兼而有之。那么 1915 年后，强邻加上强敌的日本给中国带来的“亡国灭种”危机则是实实在在，步步紧逼，迫在眉睫的。在如此全面性的危局之下，很难想象若无民族主义“可贵”一面自清末就开始的普及，中国将如何自存？中国人将如何应对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战争？所幸我们懂得了现代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性亦通过八年全民的抗战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朱自清说：“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启蒙过程就在救亡过程之中，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说是此消彼长，二元对立的关系。

不过朱自清尽管热情地肯定民族主义之“可贵”，并且引美国之谚语云：“我的国呵，对也罢，不对也罢，我的国呵！”但他依然认为“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④那么这个理想该如何实现？若回到钱穆的看法，我们或许会发现光知晓和普及民族主义之“可贵”一面仍然不够，要叠加整合的是民族主义之“可爱”的那一面，即钱穆所说的历史、语言与风俗，同时也是胡适所谓的“历史的大维系”。但就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塑造看，这一面相极其复杂，因此厘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时代就极重视历史、语言与风俗，但读书人对历史、语言、风俗的重视是植根于“天下”的。在这套“天下”的认同里有国家的位置，但并不处于至高的位置，它被安放在身一家一国一天下的序列之中。读书人当然会对“易姓改号”的“亡国”黯然神伤，但最担心的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的“亡天下”。同时亦有民族（夷夏之辨）的成分，但夷夏之辨其底色并不在种族而在文化。缪钺就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重在文化而不沾滞于血统”。^⑤因此“天下”认同的实质是“文化认同”，何以成“中国”最后决定于文化，何以成“华夏（族）最后亦决定于文化”，这种对文化的重视使得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建基于苍生意识、科举考试、宗族建构和神明信仰等文化性观念和制度上，这些观念与制度的特色从其范围来说既是国家的亦是普世的，由人及家，由家及国，由国推及天下。从其时间来说既是现代的亦是传统的，即通过不断地追溯思考过去，来垂鉴当下，引领未来。^⑥

自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西人用炮火打碎了中国的藩篱。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不仅仅表现在疆土沦陷与主权丧失上，更表现在两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上。^⑦因此前述的那些观念和制度统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反传统”且以“反传统为爱国”的严重挑战。以“民本”为基础的苍生意识因为抵抗列强侵略的需要而让位于富强的观念。科举考试因被认为凝滞僵化，“难得人才”而遭大幅度改制，直至被士大夫自己所消灭，且至今仍未找到合适地衔接政与教的制度安排；宗族和神明信仰系统更是在被认作“迷信”的名义下要被全面铲除。20 世纪 20 年代旅京的一些外省青年就提出：“我们以为家庭、妇女、婚姻及一切社会之传说、风俗、习惯，皆是前代历史的残渣，只有在政治革命及生

①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11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88 页。

②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③④ 朱自清：《新诗杂话》，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43 页。

⑤ 缪钺致熊德基（1983 年 1 月 28 日），收入缪朗朗编：《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17 页。

⑥ 程美宝：《国家如何“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14 日。

⑦ 杨国强：《维新变法与儒学的异化》，《史林》1998 年第 2 期。

产革命以后，烈火盛焰摧陷之。”^①到30年代有人仍在说：“那些线装书、那些偶像、那些庙宇，那些军阀官僚，那些古董，那些传统，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②

以上说的是那些处于过渡时代，旧学无底、新学无根的人物对民族主义之“可爱”一面的看法。那么如钱穆、章太炎等很读过些中国书，强调民族主义之“可爱”的读书人，又为何得不到太多的呼应和肯定呢？这当然是由于在现代中国“以反传统为爱国”的读书人占据了学界的中心，舆论的主导，尊西崇新的风气异常强势，强调民族主义“可爱”之人基本上会被定义为一个落后、保守、冬烘、古板、没落的读书人。但问题也出在钱氏、章氏自身。他们虽然认识到民族主义之“可爱”一面，但同时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也受到清末流行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的影响，那时他们试图要做的事就是“强分种族”，特别是“剖清汉种与满种”。因此在他们说民族主义之“可爱”的开始阶段，此种“可爱”就经常扭曲变形为（大）汉族民族主义之“可爱”。章太炎在《正仇满论》里会用文字、风俗等因素来论证日本与中国更加亲近，满洲与中国反而疏离。^③又为与严复商榷《社会通论》的论点，用其如椽巨笔听任蒙古、回部分离而不顾。^④

这些颇牵强的说法看似在谈历史，析语言，讲风俗，但实则相当无视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语言与风俗。19世纪源自西方的强分种族观念有今日看来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人类在客观上当然存在体质、外形、肤色和语言的分别，但这种客观的分别一旦固定为僵化的分类，并受到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种种操控后，这类种族式的“民族主义”实既不“可爱”，同时也难称“可贵”。^⑤且“民族”与“种族”概念实内涵大异。金毓黻就指出：“所谓种族，专由血胤分析之，同一种族不必同一之国家；所谓民族，不专由血胤分析，又有语言、文字、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之成分在内，不过种族一端，为其重要之成分而已。”^⑥

综上，从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出发，民族主义之“可贵”一面不可或缺，但以中国之大，中国人之多，中国之历史、语言、风俗延绵之长久、影响之深远来说，民族主义之“可爱”一面亦应得到高度的重视。今日中国似仍多看重民族主义之“可贵”，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力使民众知晓民族主义之“可贵”，却较少去普及何谓民族主义之“可爱”。尊西崇新的风气实无太大改善，中国人破碎的自我形象或仍在收拾重塑的道路上。如何建构整合民族主义“可贵”与“可爱”之两面的中国式国家认同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帮助我们思考的重要资源则不少就在经历过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进程的那些读书人的经历认知里，尤其是谈论民族主义之“可爱”的那些读书人的看法。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走出种族性的狭隘民族主义，走向文化性的大民族主义。对此著名史学家陈垣有很好的阐发。陈氏早年与钱穆、太炎相似，持激烈的排满立场，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反满的文章。但随着读史的体认日深，他发现要确立强有力的国家认同必须走出种族性的狭隘民族主义，而走向文化性的大民族主义立场。这种文化性的大民族主义在塑造国家认同时看似其动员能力较弱，但似柔实坚，且能长久地深入人心。1920年代陈垣曾写过一部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这部书当然首先是精深博大的学术著作，但在学术背后，陈氏有深意存焉。陈垣在写给其子的信中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⑦正因为此书是回应“看不起中国”之人和“主张全盘西化”之人的，所以陈氏斟酌过究竟是用“中国化”还是“汉化”作为书名，最后确定用“华化”这一概念。所谓“华化”是指元代西域人如何吸收、接受和认同儒学、佛道两教、中国诗文、书画、建筑、名氏、丧葬、祠祭、居处等“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的文化性因素。^⑧陈氏不说色目人而说西域人，不说汉化而说华化，以西域人与华人相对，

①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1924年4月），《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② 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北京：西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③ 章太炎：《正仇满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98-99页。

④ 章太炎：《“社会通论”商兑》，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58页。

⑤ 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9-110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六册，1940年3月31日条，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519页。

⑦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18页。

⑧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页。

以西化与华化相对,“其故可深长思之”!^①这套文化性的,基于民族主义之“可爱”的国家认同为抗战期间在日据北平苦熬岁月的陈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他不仅写出了另一部名著《通鉴胡注表微》来表露自己誓不屈敌的心迹,而且强调说“昔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分,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大。分之则无益于国家,无益于民族”!^②

第二个则是如何在塑造国家认同中激发中国人的大国民心态。无疑今日中国正在崛起,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体与经济体之一。但在国家认同的塑造中中国人经常并不太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大国民”。这自然与前文所述绵延至今因尊西崇新而只知追赶美德英法等列强,并关注列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风气有关,这种风气使得中国传统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智慧往往隐而不彰,其实孟子所谓各国间“事大字小”的原则恰能够为中国人培养“大国民心态”提供古老却弥新的资源。“事大字小”说的是小国对大国的侍奉和大国对小国的爱护,其核心在以礼(实质就是文化)划分国家等级,又以礼而非强力联结大国、小国,造成一个看似松散却又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国际体系。在此体系里强调国与国之间互相的责任,尤其是大国对于小国的责任,而不是利益的计算,这使得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总是不缺心系小国,包容小国的大国民心态。即使在清末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实际地位甚低微的时候,章太炎等仍从来源于历史、语言、风俗的“固已潜在”的“民族根性”出发说“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③;“且以为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④此种因民族主义之“可爱”而推向世界主义乃至“禽雀牲畜”等一切生物的看法,正论证了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所说“爱国同时也可作世界公民”理想的可能性^⑤,值得我们一再深思。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化研究(1895-1919)”(11CZS057),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11PJJC04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本专题讨论责任编辑:张洪彬)

① 陈智超前言,收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4页。

② 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6页。

③ 章太炎:《五无论》,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55页。

④ 章太炎:《定复仇之是非》,张树、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770页。

⑤ 臧继贤:《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爱国同时也可做世界公民》,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050, 2015年1月28日访问。

Multiple Creation of Identity of State in Modern China (Symposium)

Xu Jilin, Shen Jie, Song Hong, Yan Quan & Qu Jun

Abstract: Xu Jilin believes that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ational Period was at chaos because a lack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What the political forces scramble was only the political power, resulting in the chance of re-construct the authority of state time and again. Shen Jie holds that it was the multiple authorities, i.e., a multi-layer scramble between warlords and KMT, between the warlords, and among KMT factions, caused endlessly political disorder. Song Hong puts up that the suggestion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had an obvious ground of public opinion, but it failed because of many difficulties in reality. Yan Quan mentioned the advocate of provincial constitution for local power in early national period, and believes that, in 1923,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had created a federal power divi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it was soon disrupted by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Qu Jun points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olding a state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the “treasure” of nationalism w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nd its “loveliness” was neglected..

Key word: Revolution of 1911, state authority, state power, state identity, nationalism